

唐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

文物出版社

唐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張希廣  
責任印製：王少華  
責任編輯：趙磊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唐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荒金大琳，荒金治整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010-2291-5

I. 唐... II. ①荒...②荒... III. 楷書—碑帖—中國—唐代 IV. J292.2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7) 第123890號

唐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

荒金大琳 荒金治 整理

\*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文博利奧印刷有限公司製版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1/8 印張：15.5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291-5 (全兩冊) 定價：46.00圓

## 關於《雁塔聖教序》的幾個問題（代序）

荒金 大琳

荒金 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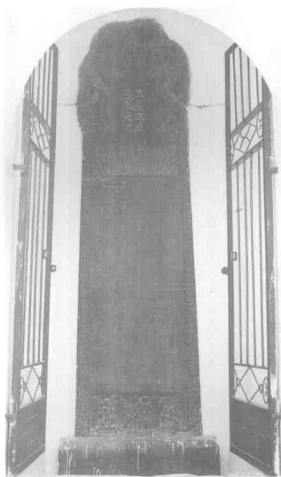
《雁塔聖教序》建于永徽四年（653），由太宗、皇太子李治（後來的高宗）撰文，褚遂良書。唐初是楷書初步成熟的時期，在太宗喜愛王羲之書法的背景下，《雁塔聖教序》有着濃厚的行書味道，即在這塊楷書碑中，可以看見許多的行書筆畫。

這次使用的拓片是宋拓本，在歷代傳下來的拓片裏是數一數二的。我們通過對原碑的研究，發現很多細膩的部分在拓片上沒有顯示出來。這次公開的照片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雁塔聖教序》的原貌。碑中大量修正的線條告訴我們，這塊碑的書法曾經被修正過。從修正的事實出發，我們可以聯想到建碑時的一些不太正常的情况。褚遂良是當時的宰相，正常情况下，絕對不會留下這麼多的修改的筆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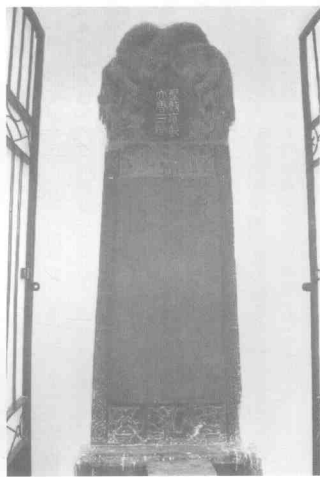
楊守敬到日本介紹漢唐碑刻以後，日本書法界對碑刻的研究成果日益豐碩。與楊守敬有過直接交流的日下部鳴鶴的弟子比田井天來與松田南溟對《雁塔聖教序》有深入的研究。他們留下了一本拓片，從中可以窺見他們研究的成果。他們在拓片上點了350個紅色與金色的點。這可能是他們認為值得研究的部分。1971年，由日本書學院出版部出版了《書學院本·雁塔聖教序》，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前面所說的金點與紅點。可惜的是，他們沒有留下文字說明來解釋他們的研究成果。

我們對此研究一段時間後，認為一定要親眼看原碑。我們申請了好幾次，但一直沒有實現這個夢想。1967年，在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陳永興先生、陝西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西安市大雁塔保管所等的幫助下，終於實現打開鐵架子，讓我們能夠靠近原碑研究的夢想，在此特向他們表示感謝。在仔細觀察原碑的同時，得到了拍照的許可。這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整理這些照片，並進行放大研究，發現在全文1750個字中，978個字裏共有1750個修正的地方，很多地方如果只看拓片的話是看不見的。而且親眼看原碑也一樣有限，只有在放大的情況之下能夠發現真實的情况。在原碑面前拿着放大鏡研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放大塔不允許一個字一個字研究。回日本後，我們把每一個字放大到2.5紙那麼大，發現那些修正的線條後心裏有解除大秘密的感覺。

褚遂良在永徽四年（653）時，任尚書右僕射，做為長孫無忌之後的第二位宰相，卻留下了這麼多的不自然的現象。我們為褚遂良難過，



序碑



序記碑

因為如果他做為宰相，情況很正常的話，肯定有機會處理這麼多的修正綫的。從褚遂良的前後經歷可以看出他的巨大變化。太宗去世後，高宗即位。褚遂良被任命為顧命大臣，但是第二年（永徽元年）被左遷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召回長安以後，永徽六年為了反對高宗與武則天的結婚，受到了第二次左遷，最後死在愛州（現在的越南）。《雁塔聖教序》的建立年代正好在褚遂良第一次左遷與第二次左遷之間。我們認為兩次左遷的基本原因是高宗對褚遂良的排斥。但為了建立《雁塔聖教序》，高宗需要褚遂良的手筆。這是在《雁塔聖教序》裏出現修正綫的背景。

《雁塔聖教序》的原碑在大雁塔的兩側龜裏，盡管保護的狀態比其它碑好得多，但還是有很多殘損的。為了避高宗的諱，「治」字的最後一筆原來是沒有的，現在的照片裏看到的最後一筆是後來的人補上的，看照片時必須要注意這方面。在宋拓裏，石碑的每一行的最後幾個字由于磨損看不清，很容易引起誤會，認為這是後來的風吹雨淋造成的磨損。但實際上，石碑下面的雕刻並沒有被損壞，從此可以推斷每行的最後幾個字的磨損，建碑時已經是這個樣子。從照片上看這些文字，在石頭不平的情況下還是有文字的，也許由于石質與其它部分不同而刻起來比較困難。

本書把太宗的《序》與高宗的《序記》，分為兩冊。《序》和《序記》的原碑本來是分別立在大雁塔南門西側和東側的龜裏，分為兩冊是最合理的。《序》的行文為從右到左，《序記》為從左到右，在大雁塔看碑的時候可以看到從中間分別向西、東兩方背向行文的特殊形式。所以我們採用了與原碑一樣的排版。

通過對照片的整理，我們發現了多個方面的問題。下面討論其中的四個問題：一、關於《雁塔聖教序》兩塊碑的左右布局；二、關於褚遂良的第一次左遷；三、為什麼兩塊碑建立於永徽四年；四、關於修正綫。

《雁塔聖教序》從貞觀二十二年（648）撰寫文章到永徽四年（653）的立碑，經歷了比較複雜的一段時間。從太宗到高宗的皇帝的變化，褚遂良的升官與兩次左遷，這些因素與《雁塔聖教序》現狀的造成都有密切的關係。永徽四年這個時間是太宗在位時早就安排好的，這五年間各種各樣的變化讓這兩塊碑不得不產生了無數個修正的痕迹。

## 一、關於《雁塔聖教序》二碑的左右布局

《雁塔聖教序》由唐太宗撰的《大唐三藏聖教序》（以下簡稱《序》）與唐高宗撰的《大唐三藏聖教序記》（以下簡稱《序記》）組成。《序記》的最後說：「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嶽，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從此可見，高宗李治看了太宗的《序》以後書寫了《序記》，因此文章的順序絕對是先有《序》，後有《序記》。因為中國自古習慣於從右到左的書寫方式，所以很多人以為右為《序》，左為《序記》。實際上，在大雁塔的左右兩龕裏，不僅兩塊碑石保持左右對稱，而且兩篇文章的行文格式也左右對稱，即左龕為《序》，從右至左行文；右龕為《序記》，卻一反常規從左至右行文。這是《雁塔聖教序》的獨特情況。

在日本，包括《書道全集》在內，很多書籍誤地介紹《序》與《序記》的位置，其中最關鍵的人物是關野貞博士。他在1908年訪問中國西安，後來在《支那的建築與藝術》和《支那文化史蹟》兩書中都介紹錯誤。這是「東為聖教序碑，西為聖教序記碑」的最早記錄。因為關野貞當時影響很大，而且那個年代很多人沒有機會親自考察，因此後來的著者只能參考關野貞的記載，而繼續錯誤。與關野貞幾乎同時在西安考察的足立喜六卻在1933年東洋文庫出版的《長安史蹟研究》一書中留下了正確的記載。但當時比起關野貞來，他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我們通過實地考察，確認了正確的左右布局關係，而撰寫了《關於雁塔聖教序位置關係的考察》<sup>1</sup>，接着發現這個問題與建立經過有密切的關係，又發表了《雁塔聖教序建立的經緯》<sup>2</sup>。其建立經過為：

1 荒金信治《雁塔聖教序の位置關係における一考察》，《別府大學國語國文學》第23號，1991年。荒金信治，號大琳。

2 荒金信治《雁塔聖教序建立の經緯》，《別府大學紀要》第34號，1993年。其中文題為《關於〈雁塔聖教序〉建立經過的一點思考》，收於《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96—100頁。

- ① 玄奘從印度回來，請太宗寫序文。
- ② 太宗寫序文後，皇太子李治寫序記文。
- ③ 以弘福寺寺主爲首的長安的僧人申請立碑。
- ④ 中書令褚遂良書寫二序文，字體靠近行書，在一張紙上從右到左，兩篇文章連續書寫。
- ⑤ 太宗崩駕，高宗即位。
- ⑥ 褚遂良被左遷爲同州刺史。
- ⑦ 褚遂良從同州回京任吏部尚書，又升爲尚書右僕射。
- ⑧ 重新書寫聖教序。這次布局分成兩塊碑，序爲從右到左，序記爲從左到右。但是寫得沒有原來的好，只好使用原稿的字來進行修改。
- ⑨ 立碑。

由于立碑時高宗是皇帝，雖然《序記》本身是在《序》的後面撰寫的，但其地位不能在《序》的後面，這個時候有人想到了左右布局的方法，現在沒法考證是誰的主意，但是這個建議就是爲了剛剛當皇帝不久的高宗而想出來的。慈恩寺是高宗爲了母親而建的寺廟，高宗做爲主人，與太宗關係並列，這樣從文章的順序來考慮也沒有問題。現在我們在大雁塔看到的就是如此明顯的對稱關係。大雁塔南門西龕有《序》，東龕有《序記》，即左爲太宗的《序》，右爲高宗的《序記》，行文方向從中間向西向東走，即《序》是從右到左，《序記》是從左到右，前者題額是隸書，後者爲篆書，褚遂良的官名，前者爲中書令，後者爲尚書右僕射，年月日，前者爲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啞食，後者爲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

其中有時間概念上的矛盾。褚遂良任中書令是唐太宗在位時，即從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到被左遷的永徽元年十一月，而任尚書右僕射是從永徽四年九月甲戌至再次左遷的永徽六年九月庚午。這兩塊碑建立時褚遂良明明是尚書右僕射。這個矛盾從左爲太宗的《序》，右爲高宗的《序記》的對稱關係角度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中書令是褚遂良在太宗朝時的官銜，所以應該在太宗的碑文裏使用。同時，從這個中書令的記載可以推測褚遂良在中書令的時候書寫過這篇文章的可能性，做爲我們所說的修改筆畫之前存在原稿的旁證。

## 二、關於褚遂良的第一次左遷

唐太宗臨死之前，封褚遂良與長孫無忌爲高宗的顧命大臣。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初一，唐高宗即位，開始了稱爲「貞觀遺風」的高宗前

期。高宗前期是以關隴集團為中心而發展的。名義上，關隴集團的兩位大臣是顧命大臣，擁有極高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關隴集團的道路快到盡頭了。早在永徽元年，已經有了對關隴集團不利的幾件事情。

唐太宗崩殂後，後宮的嬪妃們應該去寺廟做尼姑。當時武則天也到了感業寺。不久，「大帝於寺見之，復召入宮，拜昭儀」。她們的長子李弘出生於永徽二年，說明他們在十個月前，在永徽元年的一年裏，高宗與武則天已有關係。做為顧命大臣的二人當然不能同意高宗與武氏的關係。武氏是太宗才人，兒子就不能有這種不道德的行為。

褚遂良強烈反對武則天，永徽六年的鬥爭可以說明這一點，在《舊唐書》、《新唐書》以及《資治通鑑》等史書裏詳細記載了永徽六年褚遂良反對武則天的情景。雖然在文獻上沒有看到永徽元年當時的情況，但是從永徽六年的對話來看，褚遂良對武則天的態度肯定是一直強烈反對的。

長孫無忌既是顧命大臣又是國舅，他的地位應該是相當穩定的。但是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李弘泰是「術人」。于志寧對此看法是，「今告為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不管有沒有後果，發生了這種事情，說明長孫無忌的權威也受到挑戰。高宗稱帝時才二十二歲，比起唐太宗來差別太大了，統治的能力明顯下降。不管怎麼樣，當時的唐高宗與做為顧命大臣的長孫無忌、褚遂良，都應該齊心協力於治國。從上述事情推測，高宗對他們兩位大臣的印象不是很好。褚遂良曾經為李治當皇太子出過不少力量。在褚遂良強有力的幫助之下，高宗最後當上了皇帝，高宗應該是感謝他的。但高宗是從小就性格懦弱的人物，也許根本没想過當皇帝。他是唐太宗的第九子，在一般的情況下，不可能得到皇帝的寶座。原來跟皇帝無關的李治一下子有了皇太子的地位，可以想見他的一邊高興一邊猶豫的心理狀態。接着當皇帝以後，他應該可以掌握天下，他也知道唐太宗是怎麼做天子的。但是跟太宗年齡差不多的褚遂良作為顧命大臣，已經堅定地決心教育李治，所以褚遂良對李治的諫言自然越來越

1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115頁。

2 根據《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李弘死于上元二年（675）四月己亥日。又據《新唐書》卷八一《孝敬皇帝傳》，弘死時年二十四。從這些史料可以推算，李弘出生于永徽二年。

3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中華書局，1956年，6289-6290頁。

4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6270-6271頁。

5 《舊唐書》卷九一《桓彥範傳》，2927頁。

6 《舊唐書》卷七八《于志寧傳》，2698頁。



多，高宗一天一天也增加了心理壓力。高宗就這樣開始討厭褚遂良，他也考慮過不要顧命大臣的想法，但在太宗的巨大陰影之下，不可能輕易地放棄他們。褚遂良的第一次左遷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兩《唐書》的《褚遂良傳》與《高宗本紀》裏，只記載了褚遂良左遷到同州作刺史的事情。《舊唐書》卷八〇《褚遂良傳》云：「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奉事出為同州刺史。」在上述文獻裏邊沒有寫理由，所以到了今天在介紹褚遂良的時候，往往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但實際上，永徽元年的這次鬥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討論關隴集團的結束時，不能只考慮永徽六年廢王立武的鬥爭。我們認為關隴集團在這個時候已經走上最後階段，高宗對兩位顧命大臣的微妙感情使關隴集團開始走上衰落。

其實，兩《唐書》的《韋思謙傳》與《唐會要》以及《資治通鑑》裏有褚遂良左遷的直接理由。《舊唐書·韋思謙傳》載：「時中書令褚遂良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新唐書·韋思謙傳》又載：「中書令褚遂良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資治通鑑》卷一九九載：永徽元年「冬，十月……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大理少卿張叡册以為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為定！』叡册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為同州刺史，叡册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唐會要》卷六一載：「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史訶擔宅。監察御史韋仁約劾之。大理丞張山壽斷，以遂良當徵銅二十斤。少卿張叡册以為不當，估宜從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耳。園宅及田，不在市肆，豈用應估。叡册曲憑估買，斷為無罪，大理之職，豈可使斯人處之。』遂遷遂良及叡册官。」史訶擔就是史訶耽，其墓在寧夏固原被發掘出來，在《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有詳細的介紹。據其墓誌銘，我們可以知他的生平。他是史國國王的苗裔，原州平高縣人。《墓誌》云：「武德九年，以公明敏六閑，別敕授左二監。奏課連最，簡在屢聞。尋奉敕直中書省翻譯朝會，祿賜一同京職。貞觀三年，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請郎。九年，又加授通義郎。十三年，又加授朝議郎。十九年，丁母憂。集蓼崩魂，匪我繼痛。同子羔之泣血，類叔山之荒毀。永徽四年，有詔：朝義郎史訶耽，久直中書，勤勞可錄，可游擊將軍，直中書省翻譯

1 《舊唐書》卷八〇《褚遂良傳》，213頁。其它記載如下：《新唐書》卷一〇五《褚遂良傳》，402頁；「坐事出為同州刺史。」《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上，68頁；「十一月己未，中書令、河南郡公褚遂良左授同州刺史。」《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93頁；「十一月己未，貶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2 《舊唐書》卷八八《韋思謙傳》，2861頁。

3 《新唐書》卷一六《韋思謙傳》，422頁。

4 根據吳玉貴《資治通鑑疑年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206頁云：月內無己未……《通鑑》「己未」上「十一月」，時間是十一月的。

5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6272-6273頁。

6 《唐會要》卷六一《御史臺》中《彈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57頁。

如故。名參省禁卅餘年，寒暑不易。其勤終始彌彰，其格屬日月休明，天地貞觀。爰及升中告禪，於是更錫崇班，是用超遷，出臨方岳。乾封元年，除虢州諸軍事、虢州刺史。」<sup>1</sup>唐代中西交通發達，「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有譯語人」<sup>2</sup>。從此可以確定史訶耽在中書省工作過，而且曾經是褚遂良的手下。根據他的《墓誌》，永徽元年前後的事情對他沒有什麼影響。

褚遂良抑買的具體宅地不能考知。文獻上只知道褚遂良原來住的地方在長安城平康坊，「西門之南，尚書左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宅。自遂良父太常卿亮居焉」。<sup>3</sup>《隋唐嘉話》的故事講的也應該是平康坊的宅：「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sup>4</sup>褚遂良從小跟着父親生活，「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為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sup>5</sup>。一直到褚亮去世的貞觀二十一年，他們父子還住在一起。《褚亮傳》的最後一個場面是下面的一段：「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為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退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sup>6</sup>在褚遂良的一生中，父親褚亮的影响非常大。褚家的家長一直是褚亮，看太宗的行為就知道，褚亮是對太宗也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褚亮，就完全沒有褚遂良。褚遂良也應該清楚這一點。褚遂良在褚亮去世後，升官到中書令，成為高宗的顧命大臣，開始有了完全靠自己的生活。大概褚遂良以為高宗跟自己具有一樣的環境，所以對高宗的感情特別深，也許這種過深的感情引起了高宗對褚遂良的不滿。在《大唐新語》裏也有記載：「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為清水令。」<sup>7</sup>這是唐代元和年間的劉肅寫的。雖然所寫褚遂良的官是錯的，應該是中書令，但這個故事流傳下來，說明韋思謙的清廉是真實的。

如果唐高宗要重用兩位大臣的話，褚遂良的事情可以由高宗來保護的。褚遂良的第一次左遷說明唐高宗對褚遂良不予支持。高宗恰好遇到這件事情，就利用此事而讓褚遂良左遷。

1 《大唐故史公黨誌之銘》，羅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68-70頁。

2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6273頁，胡三省注。

3 《長安志》卷八《平康坊》，《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冊，中華書局，1990年，114頁，「尚書左僕射」為「尚書右僕射」之誤。

4 《隋唐嘉話》卷中，中華書局，1961年，27頁。

5 《舊唐書》卷八〇《褚遂良傳》，2729頁。

6 《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2582頁。

7 《大唐新語》卷之二《剛正》第四，中華書局，1984年，29頁。

永徽元年褚遂良左遷爲同州刺史。但在今天所看到的文獻上，沒有一個關於褚遂良在同州的資料。同州是今天的陝西省大荔縣。

### 三、爲什麼建于永徽四年

褚遂良任一年多的同州刺史後，又回到了中央政治舞臺。永徽三年任吏部尚書，永徽四年升到尚書右僕射。後來永徽六年，出現廢王立武的鬥爭，被左遷。從時間上講，這時期完成了《雁塔聖教序》，這是褚遂良最著名的作品，成爲褚體的典型書法碑刻。

根據石碑落款，《雁塔聖教序》建立于永徽四年的十月與十二月。褚遂良什麼時候書寫本文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文章本身是貞觀二十二年八月由唐太宗與皇太子李治來撰寫的。褚遂良貞觀二十一年十月「以父喪罷」後，二十二年「二月，遂良起復」。所以高宗撰文之時，遂良正任職爲黃門侍郎。第二月，升爲中書令。虞世南去世後，褚遂良是由魏徵推薦的，成爲朝中大書法家。三年後，歐陽詢也去世了，這時候可以說當時的書法名家已經沒有人能比得上褚遂良了。在太宗的想法裏肯定有由褚遂良書寫《雁塔聖教序》的計劃。太宗最喜愛的《蘭亭序》寫於永和九年（353）癸丑年。癸丑年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此時下一個癸丑年快到了，就是假定的貞觀二十七年（653）。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人怎麼看這些年代，即癸丑年所表現的年代意識。《西溪叢語》有下面記載：

東坡《和陶》詩云：「再游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呂渭、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由此可知，癸丑年的大曆八年（773），朱迪、呂渭、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在蘭亭進行紀念王羲之《蘭亭序》的詩會。「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對唐朝人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年。他們這次碰上了癸丑年，而且進行紀念性的活動很不容易。從此可以推想太宗與褚遂良等大臣們也討論《蘭亭序》好多次，應該對「癸丑年」有所感情。一定有人想過下一個癸丑年怎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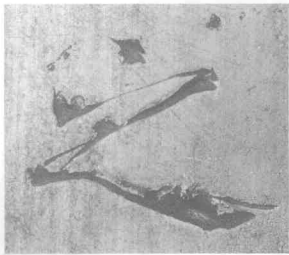
我們認爲《雁塔聖教序》建于癸丑年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地配合《蘭亭序》的年代。貞觀二十二年，「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雖然這一段後來直接體現爲弘福寺懷仁集王羲之的《集王聖教序》，但是好像開始時沒有說集王羲之的字，

1 鄭寶珩《唐刻史考全編》卷四《同州（馮翊郡）》（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110頁介紹褚遂良任同州刺史的文獻。除了《冊府元龜》、《大唐新語》、《資治通鑑》中與兩《唐書》類似的記載以外，只有《全唐文》卷一四九褚遂良《故漢太史司馬公侍妾隨清娛墓誌銘》的記載：「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

2 《新唐書》卷六一《宰相表》上，1637頁。

3 《西溪叢語》卷上《蘭亭會》，中華書局，1993年，33頁。

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中華書局，1983年，149頁。



選自序碑

再說根據這一段話，不僅僅是弘福寺要建立，而是「京城僧等」的願望。所以，貞觀時期褚遂良寫過《聖教序》的可能性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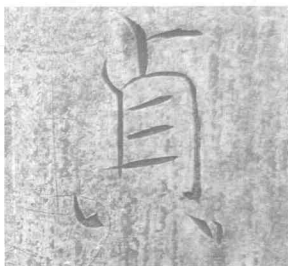
可惜的是第二年唐太宗去世了。隨後，即永徽元年，褚遂良被貶為同州刺史，結果圓定申請的建碑的事情停頓了一段時間。褚遂良從同州回到長安，在「癸丑年」的前一年，永徽三年正月己巳，「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sup>1</sup>。為建立《聖教序》碑跨出了關鍵的一步。第二年，「九月甲戌，遂良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選事」<sup>2</sup>。這樣，寫碑的最佳時刻也同時到來。

二序文本本身的關係是先有《序》後有《述記》。所以，如果褚遂良在貞觀年間寫過碑文的話，當然先寫太宗的，接着寫李治的。到了永徽年間，唐高宗李治已經是皇帝。皇帝應該是天下第一，為了避免高宗為第二的位置，做了一些調整，從中間向左右寫文章，就是兩個都是上位，成為左右對稱的完整的一套碑。

在這次調整的過程之中，褚遂良遇到了不少苦惱。第一次揮毫時，可能還沒有正式準備建石碑，所以含着一點行書的風格。後來左遷到同州，又回來的時候，高宗讓褚遂良開始準備建立石碑。為了建立石碑而回到長安的褚遂良當然心情不會是開闊的，揮毫了幾次都不如以前寫得那麼好，最後不得不用以前寫的稿子來修正文字，所以出現修正的痕迹，修正的特點就是從行書筆畫改成楷書筆畫。

1 《新唐書》卷六十一《宰相表》上，1038頁。

2 同上，1039頁。《新唐書》為「尚書左僕射」是「尚書右僕射」之誤。



選自序記碑

在此最大的疑問是，為什麼留下原來的線條？在一般的情況下，修正、補筆以後，最後完成的時候應該看不出修正的痕迹。如果痕迹留下來，就不雅觀了。褚遂良的書法水平是相當高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會有這種結果，所以應該考慮他的不正常的狀況。

#### 四、關於修正綫

比田井天來、松田南溟兩位書法家留下了《書學院本·雁塔聖教序》<sup>2</sup>。在此拓片上，共有320個金色與紅色的點。比田井天來的兒子比田井南谷在《後言》裏說：「關於這些一個一個點，真可惜沒有問清楚。」<sup>3</sup>此後一直是一個迷。

從那以後，我們一直關注這個問題。1997年終於有機會在西安大雁塔成功地拍攝了原碑的照片，開始使用放大照片來研究《雁塔聖教序》細部存在的問題。其結果已經於1999年在日本筑波大學舉行的第九回書學書道史學會大會上，發表了《關於雁塔聖教序

1 比田井天來(1821-1930)是日本著名書法家，稱為日本現代書法鼻祖。1860年，楊守敬在擔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隨員期間，與書法家日下部鳴鶴建立了非常親密的友誼。「他的書法對日本很有影響，日本大書法家日下部東作，曾虛心向他請教，兩人相互切磋琢磨，成為師友之交。直到現在，日本書法界還在研究，提倡楊守敬的書法。」(《楊守敬集》第一卷，謝承仁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27頁。)比田井天來是日下部鳴鶴的弟子。在他們的影響之下繼續投入研究古代書法。

2 《書學院本·雁塔聖教序》，書學院出版部，1977年。發行者為比田井南谷。

3 同上，「後言」。

的線條的考察》<sup>1</sup>，1911年又發表了《探討雁塔聖教序的不可思議的刻綫》<sup>2</sup>。一般把文字修改的時候，原稿的線條都會進行抹殺處理，但在《雁塔聖教序》裏，原稿與修正的痕迹都留下來了。在此介紹我們看到的情況。

在《序碑》的821個文字裏有566個文字、860處修正，在《序記碑》的642個文字裏有412個文字、623處修正（見文後圖表）。研究的過程中，有的修正部分是把文字擴大到原大的10倍才能看清楚的。在大正（1912-1926）年間，天來、南溟兩位書法家，光看原大的拓片就找到了這麼多的疑問，應該值得佩服。把拓片與照片比較起來一看就知道，很多修正部分是在拓片上絕對看不到的。再說如果有人去大雁塔親眼看原碑，也一樣找不到這麼詳細的統計結果。

我在《關於雁塔聖教序線條的記錄》<sup>3</sup>一書裏，按修正的特點來分類介紹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把行書風格改正為楷書風格的一個統一的修正理念。並不是所有的現象都是如此修改，但這種方式占了很大比例。線條的前後、上下有點與短綫，以及拐彎的地方加上的點畫等等都是行書楷化的構思的表現。

看照片後可以發現從行書用筆到楷書用筆的修正，這種修正現象似應揭示出褚遂良完成書碑的過程：一、先是用非正書體（行書表現）來寫；二、因為被左遷為同州刺史，離開了一段時間；三、回復後再寫一次，但沒有以前寫的好，只能用以前寫的作品作底本，進行修正。

由于篇幅有限，本書還是原大印刷，在此提供幾張放大的照片，請讀者觀賞。

- 1 荒金大琳《雁塔聖教序の綫に關する考察》，《第二回別府大學書道部書道選拔展》，1999年。
- 2 荒金大琳《雁塔聖教序の不思議な刻綫を探る》，《墨》第157號，2002年，43-47頁。
- 3 荒金大琳《雁塔聖教序に關する記錄》，（有）啓程SHO出版部，2003年。

修正文字與修正處關係表  
如「修正2處」指一個字有兩處修正。  
本書中部分修正處，在石碑照片上用白點標明。

	修正文字	修正處
修正1處	347	347
修正2處	157	314
修正3處	51	153
修正4處	9	36
修正5處	2	10
小計	566	860

	修正文字	修正處
修正1處	251	251
修正2處	118	236
修正3處	29	87
修正4處	12	48
修正5處	2	10
小計	412	632

大略 太宗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定以窺天鑿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舒指早  
 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變乎天其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其  
 不惑形譚莫測在智彌達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締弘濟萬民共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仰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豪釐無滅無生應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疑玄蓋之莫知其  
 法深其窮極之莫測其源故知蠶蠶凡愚區區庸鄙投其首趨無妄疑感者衆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而土鴻濛  
 庭而皎夢照東城而汎慈昔者分於分蹟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遺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眾家開闢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極舍類於三途遺軌遐宣薄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神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無  
 在泚時而陰替有奔英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勿懷真敬早悟三空之心長契情先苞四恩之行公風水月  
 未之此其清華仙露明珠詠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越六序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發一內境  
 悲正法之陵道極處玄門慨深文之記謀思欲分餘析理廣欲前開載徒續真蒲茲後學是以起心學上往往  
 而城非危遠遭劫榮孤心積雲晨飛塗關失地驚砂夕起空外遠天萬里山川發煙霞而道影百重寒暑騰清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具教於上賢探晴妙門持窮奧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蘊之文波慈  
 口海爰自百慮之圖槐將三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騰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有於東垂  
 教教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缺共拔遠逾明受水之暮波同臻欣存是知慈同黨隆善以緣罪畢  
 由西附者高則後物不能累而過者淨則濁類不能留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放善況乎人倫有識不  
 而求慶方無茲絲施施日久而無窮斯論遊教興軌坤而永大 在也 中書令臣情悅良考

行文方向

制

制

大

大

三

三

唐

唐

藏

藏

太

太

聖

聖

宗

宗

教

教

文

文

序

序

皇

皇

蓋

蓋

帝

帝



載

載

聞

聞

以

以

二

二

含

含

儀

儀

生

生

有

有

四

四

象

象

時

時

顯

顯

無

無

覆

覆